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实践活动之“两会声音”

加强农村污水处理 建设北京美丽乡村

民革北京市委

中国地质科学院历时5年完成的《华北平原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显示,华北平原浅层地下水综合质量整体较差,遭受不同程度污染的地下水高达44.13%,华北平原局部地区地下水重金属超标、有机物污染较严重,部分城市和工业企业周边地下水污染呈恶化趋势,严重威胁地下水饮用水源安全。为切实加大水污染防治力度,我市开展了“地下水保护和污染防治三年行动方案(2013年—2015年)”等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城镇污水处理能力及再生水利用率均有显著提升,水环境治理取得明显成效。

随着相关工作的不断推进,水环境治理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农村污水处理问题日渐凸显且亟待重视和解决。目前,我市共有3938个行政村,其中352个在水源保护区内,有227个市级民俗旅游村。虽然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先后开展了新农村“五项基础设施”建设和小流域综合治理工作,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能力和处理率有所提升,但由于基础设施薄弱、污水处理难度较大,我市农村污水处理仍面临设施运行效率不高、市场化不足、缺乏运维费和专业维护、技术指导缺乏标准、监管缺失等困难,农村污水处理已逐渐成为我市水环境治理工作的短板。为进一步加强我市农村污水处理工作,建设山清水秀的北京美丽新农村,我们建议:

一、科学合理,编制农村污水处理“十三五”规划

首先,通过对农村居民生活污水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困难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科学合理地编制十三五”规划。其次,要明确主责部门,改变多头管理的现状;要明确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筹资模式、建设模式、运营管理模式、运行监督模式;出台相关法规制度,依法管理,建立长效机制,以便“十三五”期间,有序有效地开展农村污水处理工作。

二、因地制宜,制定农村污水处理方案

要根据北京市水功能区划分的要求,因地制宜地制定农村污水处理方案。在水源保护涵养区,主要出水指标应严格执行北京市《水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和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在其它地区,建议结合实际需要,科学制定污水处理方案;对于居住分散的山区,应选择分户处理技术;对于距离城镇污水处理设施较近的农村,应就近实现城带村、镇带村。尤其是要实现污水收集管网建设与处理设施同步建设,实施资金倾斜政策,加大政府财政在管网投入的力度。

三、加强科研,促进农村污水处理技术创新发展

建议根据北京市的气候特点、植被状况、土壤特征、污水主要污染物性质,结合山区、半山区和平原区村落布局、新村未来规划、农村人口集中和经济发展趋势、与水源距离、出水水质要求、经济成本要求等,评估各郊区县已经建设的污水处理设施运行情况,组织科研力量研究出若干种适宜北京农

村进行分散式或集中式污水处理的技术和设施。

四、多方努力,建立农村污水处理资金筹集渠道

一是建立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专项资金,整合分散的新农村建设、小流域治理、农村五小工程等资金项目,有的放矢地在几年内专项投入于农村生活污水设施建设项目上,包括管网建设。

二是坚持生态环境建设改革方向,健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投融资环境,鼓励社会资本对农村污水处理设施的投入,实现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专业化建设。

三是污水处理设施运维经费应纳入市区两级财政预算。尽快出台《北京市农村污水处理设施资金补贴管理办法》、《北京市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及排水管网运行维护定额》等相关政策、标准,为市区财政拨付设施运维经费提供依据。

五、专业运营,培养污水处理技术队伍

鉴于农村技术力量薄弱、人才匮乏、污水处理设施分散,建议采取公开招标方式向社会购买服务,实现专业化运行维护,由区、乡(镇)两级分担农村污水处理设施运营维护费用,确保设施正常和专业化运行。在这一过程中,可着力培养一支专门致力于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的技术队伍。

六、加强监管,促进农村污水处理健康发展

改善农村水环境,农民既是受益者,也应是监督者。在明确监管主责部门的同时,应建立多部门合作、依靠农民、社会群体参与监督的工作模式。尽快构建监管体系、评估考核体系,为有效监督奠定基础,同时,可通过招标采购服务,实施第三方监督检测机制。(本文系民革市委在政协北京市十二届四次会议上的发言)



耿晓冬:加大清洁能源使用力度



随着北京冬季接连重度雾霾天气的增加,首都北京的可持续发展面临很大挑战,这一问题,无不牵动着生活在这个城市的每个人的心,摆在我们面前的治理任务任重而道远。为此政府近年来做了很多努力,制定了很多应对政策和措施,但从现实状况看,效果不是很明显。造成雾霾的原因很多,成因复杂,其中冬季燃煤取暖污染显然是众多原因中的很重要的原因之一。但近年来我市在降低冬季燃煤取暖方面,特别是城乡结合部、城中村居民冬季取暖燃煤的措施和成效方面,力度和措施是还是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一、推进这一措施的困难的原因大概有如下几点:

- 1.处于城乡结合部的城中村一直就像城市中的一块“夹缝地”,这种独特的地位和现象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城乡二元管理体制的存在,使得城中村在改造过程中并没有被完全纳入城市统一规划、建设和管理。很多城中村农民自建简易高层房屋叠加,没有集中供暖,没有燃气铺设管道。
- 2.在土地和房屋租金快速增值的情况下,形成了大量的违章违规建筑,而没有任何规划与建设部门的批准。
- 3.存在农民、居民混杂,城乡交错,“一地两管”、“一地多主”现象。

4、街道与乡镇、村委会与居委会间的管理交叉,也造成了相互间的权责不清、扯皮推诿,统筹治理难以形成合力,有些地方府还有设障、刁难新能源用户的使用需求的问题。

二、加快解决这一难题的建议:

- 1.相关部门要在治雾霾的认识上提高到一个更高的高度,把它作为一个城市长远发展的战略。对于一时难以根治的问题,要制定短期、中期、长期的政策措施,先易后难解决。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的取暖用煤的实际需求问题,长期来看需要彻底解决集中供热的整合,清洁能源管道的接入问题,短期要尽可能利用液化天然气替代燃煤锅炉,解决冬季取暖的实际需求。
- 2.大力推进平房区、简易楼等城中村清洁能源管网的建设,将清洁能源的利用更多的侧重于基础性、公共性,可持续性。减少将清洁能源的利用与房屋产权、土地权益挂钩,造成产权问题一时难以解决,所有问题一概搁置的现状。
- 3.政府财政要引导燃煤锅炉使用人积极参与利用清洁能源基础设施的改造,彻底取缔燃煤锅炉,并加大直接补贴力度。
- 4.政府要打破清洁能源供应的利益格局,加大改革清洁能源供应端的市场化力度;扫清居民利用新能源的种种设障。

王英:建议中小学开知识产权课



能够从源头上激发创新、创业,使之可持续,因此,培育创新的文化很重要。王英委员认为知识产权能直接贡献GDP,并提到了她2015年一个调研报告中海淀、全市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数据。

她建议在京津冀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把知识产权密集型企留下,会起到风向标作用,应围绕北京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工作,建设创新型文化、创新型生态、创新型氛围、创新型环境,更好地促进创新创业。

郭耕:建议规划鸟类栖息地

委员郭耕在提案中建议,在新机场规划建设之际,机场周围拟建设湿地公园或造成飞鸟撞击隐患。

郭耕说,他早在2013年的政协提案中就曾提醒:在机场环境的规划设计上,安全因素是要预先予以考虑的。但在最近有报道披露“环绕新机场,拟建大型湿地”的消息,令人担忧。湿地是各种游禽涉禽的集中地,而鸟撞飞机是威胁航空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

有5种威胁飞行安全的鸟类在北方的几个民航机场均有分布,且具有较高的危险等级,即大鸮、红隼、家鸽、家燕和树麻雀,这几种鸟已是大兴地区最常见的、种群密度最大的鸟。

建议:征求航空部门意见规划鸟类栖息地

针对新机场周围拟建设湿地公园,郭耕建议水务部门将已有的湿地建设规划再征求一下航空部门的意见,充分论证机场周边环境建设在鸟撞预防方面应注意的要点,防患于未然。

除此之外,郭耕在前年的提案中就已指出,“破坏”栖息环境是一种减少鸟撞频率的方法,也是需要提前“规划”的。妥善处理机场及附近社区产生的生活垃圾,预先选择本地鸟类不喜欢的草种树种进行机场绿化,及时处理机场草坪令鸟类无法藏身,尽量避免机场附近有吸引鸟的湿地、树林和猛禽栖息的架子等适宜鸟类歇息的条件,都会令鸟类放弃机场作为栖息地。

另外,从整体环境的规划上,迁移栖息地是比较宏观的方

式。郭耕举例说,在上海,九段沙湿地保护区的建立就成功地吸引了原本栖息在浦东国际机场附近的鸟类,减少了该机场的鸟击事故发生率。所以,优化机场之外的鸟类分布环境,把野鸟吸引到更舒适且远离机场的环境。

郭耕强调,在这个过程中必须严管捕鸟行为,因为周边的捕杀行为则会把鸟轰赶到相对安全、没有闲散人群的机场地域。因此,在大兴地区禁止一切捕杀鸟类的行为,也是有利于航空安全的大举措。



于立荣:加快推进北京绿色建筑产业发展



于立荣在接受采访时谈到,消费者在进行购房决策时主要考虑建筑物区位、交通状况、基础设施、周边环境等因素,但建筑本身是否是绿色建筑并不是一个重要参考依据,加之绿色建筑技术和产品不够成熟,消费者购买使用绿色建筑的激励机制没有有效形成,所以目前北京绿色建筑产业发展相对缓慢。她认为,应该将发展绿色建筑列入北京市建设总体规划中,明确至2020年北京绿色建筑的比重目标。在节能减排考核中增加对绿色建筑的考核指标。明晰绿色建筑在新建建筑中应达到的刚性比例、完善绿色建筑测评体系,从整体上提升建筑的资源节约水平。明确土地招拍挂前置条件,非绿色建筑不能获得土地,对开发地块中绿色建筑的比例提出要求,对购买绿色建筑的住户给予购房贷款利率优惠。建立符合北京市发展情况的绿色金融扶持机制,培养市场化融资能力,通过经济杠杆作用激励绿色建筑的发展。

王真:需采取分级诊疗制度医治“大医院病”



按照“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分级诊疗原则,紧紧扭住“强基层”的牛鼻子,通过市属综合医院优质医疗技术和管理资源下沉,从初期的“输血”向促进“造血”转变。提高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将常见病、多发病、康复期病人留在基层。

1月23日,北京市政协委员王真在谈到分级诊疗问题时建议,以区域医联体为单位进行医保总额设定,患者一次诊疗过程连续计算,覆盖患者整个治疗和

转归过程,用有限的医保资金换回更好的健康绩效。同时,三级医院和社区机构药品目录不相吻合,不利于康复期病人、复诊病人、长期规律服药病人转至或留在社区。应扩大社区机构常见病多发用药目录,加强对三级医院使用社区用药目录的考核,使区域医联体内各级医疗机构常见病、多发病,尤其是主要慢性病的用药实现目录统一一致。疏解“大医院病”,让三级医院腾出空间更好地发挥急危、疑难重症救治的功能。

王以新:以“网络+医疗”缓解看病难问题



王以新建议由政府 and 医疗机构搭台进行网络建设。有了这个网络平台,就可以通过二级医院、三级医院等医院对接医院的方式,为病人进行会诊,拟定医疗方案。这样会对病人有很好的帮助。在日常工作中地发现发现有百分之六七十的就医都是因为常见病和多发病,完全可以在病人居住地附近的医院就医,如果需要就可以通过“医疗+网络”平台请一些专家来进行会诊。真的有疑难杂症我们也可以给他做院前的治疗方案、安排好床位、手术方案,在做好院前准备的工作之后再请他们来,这样能很大程度方便病人,也可以使北京的医院有一个准备的时间。

王以新对于实现“十三五”规划谈了自己的期许,她希望在未来5年内能从医疗价格、分级诊疗和患者就医程序等方面和国际接轨,让各级医院做各级医院的事情,大医院做研究和疑难病例,大部分病人和慢性病管理交给社区医疗,让医联体真正的联合起来,让每个医院做好自己的事情,医院方面会做的更好。

万建中:全国文化中心在传承中发展



万建中认为,在北京,文化开发和利用方面的教训很多,北京原本就有文化,每个区乃至乡村都有自己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底蕴,有着深厚历史文化根基。但是为了吸引游客,有些古村落、古建筑过度开发、过度包装,搞得不伦不类,反而破坏了原有的文化生态。所以我们不要阻止文化的传承,比如早些年禁止过年期间燃放鞭炮,强行剥夺了广大市民抒发美好愿望的权利。

前些年,有些地方没有处理好危改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关

系,危房改造以把祖辈居住在这里的人迁出市中心为代价。因为似乎城市建设只剩下拆迁一种模式。好像拆光了四合院、推平了老胡同,就是对老城市最好也是唯一的保护和建设。就文化建设而言,实际上一些旧的比新的更有价值。文化的过度开发,必然导致对文化生态的破坏,这种破坏所造成的损失是无可挽回的。

万建中指出,文化建设和发展经济不一样,不能摸着石头过河。文化发展建设一旦走了弯路,其损失是无可估量的,也是无法挽回的。不能以把发展科技和经济的经验、生硬移植到文化发展方面建设上来,这两者是完全不一样的。如今,一些政府官员既搞经济也在讲文化,搞科技也谈论文化。然而,实际上文化建设一定要尊重其内在规律,多听行内、业内专家的意见。以内行为主导,外行主导的文化建设可能导致文化的破坏。

在城市文化建设方面,如何强化一个城市及周边村落独特的文化底蕴和风格个性是最重要的。怎么样才有个性呢?个性就在传统文化里面。以后城市和城市的竞争,地方和地方的竞争是文化底蕴的竞争、文化个性的竞争。所以保持独特的文化底蕴是关键。北京在发展文化的过程中首先应考虑其发展方向是什么?发展的特点是什么?风格是什么?在“十三五”规划中,需要进行文化定位。